

中国欧洲学会 2024 年年会“大选之年的欧洲”研讨会综述

付腾浩 王玉娇 易靖萱 张博维 方弈圆

在中国欧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2024年10月19日—20日,中国欧洲学会2024年年会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隆重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欧洲学会和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欧洲学会会员单位及其他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参会。

2024年既是中欧关系的大年,也是欧洲政治的大年。习近平主席时隔五年再访欧洲,指出中国始终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2024年也是欧洲议会和欧盟机构的换届之年,欧洲政治版图进入动荡与重组时期,中欧关系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对外工作必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背景下,本届年会的召开恰逢其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开幕式及大会发言

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欧洲学会荣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研究员发表视频致辞。她通过追溯欧洲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欧洲转型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启示。周弘研究员指出,欧洲的转型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福利国家等多个阶段的漫长过程,每个阶段的转型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所驱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被逐渐淘汰,但新形式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和混乱,即“历史转型的褶皱期”。“时代精神”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现代欧洲面临的新挑战在于:尽管科技和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但思想观念却呈现出后退趋势,表现为对传统地缘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依赖,以及对集体决策和包容性原则的忽视。面对当前的转型困境,欧洲需要重拾创新思维,克服思想上的保守倾向,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社会发展模式。她认为,通过历史的长周期视角分析当前形势,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此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研究员在致辞中代表学会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中国欧洲学会旨在构建团结全国欧洲研究学人的共同体,促进理事单位与会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助力青年学者的成长。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大国之间的竞争日

益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欧洲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极右翼势力的兴起、俄乌冲突负面效应的持续外溢等。这些问题不仅对欧洲本身构成挑战,而且对中欧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冲击也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冯仲平会长希望,本次年会可以对上述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并寄语中国欧洲研究学者既要做大变局的观察者,又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建设者和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贡献者。

山东大学校长助理、青岛校区党工委书记邢占军教授在致辞中对欧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表示祝贺,感谢学会时隔两年再次给予山东大学年会主办权。他回望了山东大学123年的办学历程,对山东大学和青岛校区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情况做了重点介绍。邢占军教授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本届年会的召开对于落实全会《决定》中关于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大学愿意与学会和与会学者齐心协力,为中国国际政治学、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会长,原中国驻德国、奥地利大使史明德指出,欧洲的政治生态经历了显著变化,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和传统大党的影响力下降带来政治格局的两极分化。欧洲经济亦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企业破产和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上述因素进一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难民问题和文化冲突加剧社会分裂,致使大规模抗议和罢工频发。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挑战:法德两国的主导作用减弱,欧盟机构的权力分散,决策变得更加困

难。欧洲一体化的大方向尽管不会改变,但进程放缓在所难免。此外,中欧关系也经历了重大转折,欧洲对华政策转向政治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与经济并重。在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下,欧洲对华态度更趋负面。中国欧洲研究的学者与机构应当更加深入、实事求是地研究欧洲问题,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持。史明德大使呼吁中欧之间扩大交流、增进互信,限制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以此稳定中欧关系。他认为,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欧洲仍然是重要的“中间地带”,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欧洲的变化,维护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

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曹蕾回顾了过去一年中欧关系的重大进展和当前形势,指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是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欧,在欧洲刮起一股“中国旋风”。中欧双方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了密切沟通,增进了互信,推动了务实合作。中方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坚持对欧互利合作的基调,支持地方和民间企业开展互利交往合作,同时在对欧交往中坚决捍卫国家利益,驳斥欧方的“去风险”“产能过剩”等错误论调。希望中国欧洲学界更多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通过更精确的分析和预测,提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更积极地进行对外交流和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和中欧关系的故事。

商务部欧洲司欧盟处副处长杨祯一指出,近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中欧经贸合作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目前,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外资来源地、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以及第一大技术来源地。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双边

经贸摩擦增多,国际经贸政策环境更趋复杂,中欧经贸合作正遭遇多重风险挑战。商务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欧经贸摩擦,保护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加强对中欧经贸政策沟通,深化中欧互利合作,致力于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2025 年是中欧建交五十周年,中欧经贸合作前景更加广阔,中国式现代化为中欧双方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保持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对中欧双方具有重大意义,还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为变乱交织的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年会开幕式由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宋晓敏编审主持。19 日上午的大会发言环节由宋新宁教授主持。

徐明棋研究员以欧盟财政市场化为切入点,探讨其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在欧盟成员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无法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对维护欧洲金融和经济秩序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契约是一个维护欧元区货币稳定而非增强财政一体化的公约。成员国遵守财政纪律是欧元区经济稳定的基础,但在多重危机的冲击下,财政纪律难以维持。2024 年的欧盟财政新规可能会进一步扩充欧洲央行的职能,使其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更重要的载体。

丁纯教授指出,在中欧产业竞争态势与“去风险、降依赖”趋势愈发明显,以及欧盟将自身新兴产业发展不利归咎于中国市场扭曲的背景下,由中间品投入产出关系构成的中欧生产网络起到了将中国新兴产业政策对本国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向欧洲产业传导的作用。基于生产网络一般均衡理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政策传导效应所带来的短期影响表现在欧洲产业

总产出的增长率方面,长期的影响则体现在欧洲相关产业显示性竞争力的提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欧洲产业的依赖程度。他认为,创新协同机制形成了资本和需求的支撑,对欧洲的相关产品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产业政策在支持中国的同时也使欧洲相关产业受益。

邓翔教授认为,欧盟能源政策受到对外国能源依赖性强、气候和环境政策压力以及能源分布不均三个因素的影响。该政策在近五年表现出“双脱钩”的态势,即与化石能源脱钩和与俄罗斯能源合作脱钩。欧盟在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上既取得了一定成就,也存在隐忧,如可再生能源不稳定、核能利用和氢能发展面临挑战、能源设施投资不足、成员国之间能源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等。欧盟应考虑从能源供应稳定性、转型速度、能源储存等方向出发,提升能源政策的效果。

崔洪建教授提出了解释欧洲“保守变革”的三个视角:第一是综合的视角,即将欧洲近十年的政治变化视作一系列矛盾的综合体,而非单一的政治变化,特别是将身份政治与认同纳入考量因素。第二是历史的视角,可以尝试将欧洲现状与历史上的魏玛时期作对比。两个时期的欧洲都面临内部自由化不断放大、社会道德松弛,以及外部大国崛起、国际竞争压力上升的挑战。第三是欧美共振的视角,即 2024 年欧美同期举行大选对欧洲政治体制乃至政治制度的重大挑战。欧洲尝试在体制、制度、观念方面进行革新,开辟“第三条道路”,既在价值体系上坚持民主内核,又在政策上坚持强硬的现实主义理念。基于此,欧洲对华采取具有高度战略性的政策、推出大量限制性策略,带来中欧冲突升级的风险。中国应从近期的中欧互动中吸取经验,重新认识和研究欧洲。

吴志成教授论述了对国际关系安全化趋势的四点认识。首先,国际安全观念发生复杂变化,绝对安全观损害多边合作,以安全为核心叙事的话语语境正在形成;其次,地区冲突向集团对抗的方向发展,世界政治格局阵营化趋势加强;再次,地缘政治冲突外溢效应凸显,经贸金融制裁成为战略博弈的工具,深刻作用于世界经济格局;最后,科技竞争与大国博弈交织,国际科技人文交流遭遇严重阻碍。面对全球不安全感的扩大和国际关系的安全泛化趋势,中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明确反对国际关系的泛安全化,既推动发展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又倡导各国同舟共济、命运与共,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二 大选之年的欧洲政治

2024年是欧洲议会和欧盟机构的换届之年,也是多个欧洲国家的选举之年。面对欧洲政治版图的动荡和重构,与会学者对今年欧洲大选以及大选所反映出的欧洲政党政治、欧洲一体化新的演化趋势做出深入分析。本分论坛由史志钦教授和赵晨研究员主持。

与会者对欧洲政党政治碎片化、右翼化和极化现象开展深入阐述。林德山教授针对欧洲政党政治碎片化格局延宕、政党动荡加剧的趋势性变化,指出碎片化意味着主流政党的控制能力下降,新党角色增多,进而导致传统主流政党主导政治的局面无法持续。政党个人化是这一时期政党碎片化的重要体现,具体包含三重含义:媒体政治时代领袖在政党中的作用加强、民粹主义政党强调集权和领袖权威,以及因个人魅力而建立新政党。陈宇慧博士进一步探讨

欧洲的选举制度如何造成欧洲政党政治的碎片化问题。通过对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的分析,她指出,欧洲议会选举制度有利于倾向进行线上宣传的政党,并可能导致为赢得选举而不计意识形态和党团恩怨的拆分重组现象。她认为,技术和制度的共同作用助推了政党个人化的现象。孙润南副教授则对讨论中涉及的政党极化、碎片化与右翼崛起的现象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在2024年欧洲所有国家的选举数据中,这些现象都是不显著的。欧洲各国的政党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有效政党”增长有限;欧洲极右翼政党真正掌握政权的现象也仍然较少。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欧洲很难产生绝对执政的多数党,以及欧洲政党利用新媒体实现政治传播的现象。

2024年欧洲政治版图的一大变化是中间政党遭遇挤压,左右两翼分化势头显著。鉴于此,伍慧萍教授着重探讨了激进左翼在今年大选中的表现和影响,指出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激进左翼出现重组和联合趋势,并呈现政党创新的现象。虽然激进左翼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在集体右转的时代,激进左翼的执政前景依然比较暗淡。她认为,激进左翼联合分裂和政党创新的新动向,无疑加剧了政治极化和碎片化趋势。罗天虹副教授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就当今保守主义营垒中的极右翼与主流右翼的区别做出分析。她指出,极右翼是保守主义谱系中反自由主义的一支,强调种族因素,表现出极端排他性,并基于此逻辑反对国际化和精英主义。此外,极右翼还假借自由民主的辞令,行威权主义之实。贺之杲副研究员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角出发,建构了“思潮—血液、政党—骨骼、制度—神经”的三重政治生态维度,并以此框架对欧洲选举之后右翼民粹主义

持续高涨、绿色政治下滑、欧洲主义政党稳住基本盘和大西洋主义发生摇摆的现象加以讨论。胡志伟博士认为,欧盟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逐渐失灵,欧盟内部形成阶级间财富严重不平衡的态势,带来资本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全面对立。因此,欧盟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化与矛盾扩大趋势,在欧盟框架之内是无法消除的。

欧洲议会选举对欧盟多国内政产生影响,特别是带来了法国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等“政治地震”。宋鲁郑研究员对法国政治危机进行分析,认为法国政治在议会层面走向碎片化,在整体层面走向极端化。他认为,法国政治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从文明基因来看,拉丁民族国家往往形成多党制;从制度层面来看,法国选民结构和来源相较于第五共和国立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政治精英在极端化趋势下无法实现妥协,导致“制度安全阀”失效。

与会学者还对 2024 年举行的英国大选加以讨论。王展鹏教授指出,英国政治周期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有所差异。工党上台执政,为欧洲左翼打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工党新政府开局不利,深陷经济、政治上的多重困境,执政前景也不被看好。徐瑞珂副教授认为,英国工党政府依然怀揣大国雄心,但在实践中受困于自身实力,不得不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由此带来对美关系上战略自主与战略依赖的张力、对华关系上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张力,以及对欧关系上亲欧与疑欧的张力。

近年来,欧洲政治转型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巨大阻力,与会学者也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未来给予充分关注。阮建平教授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通过评估欧洲一体化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欧洲一体化机制的效率和欧

洲一体化的社会认同水平三个指标,认为欧洲一体化将进入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高位均衡”态势,从而形成止步不前的“第三种状态”。于京东副教授从世界史的角度阐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史,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和外交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以英国为代表的岛国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之间的分歧。他认为,岛国尊重民族国家、坚持主权国家政府间合作的思想,这与大陆国家放弃民族国家、让渡国家主权的思想之间始终存在张力。田粤皖博士密切关注俄乌冲突后欧洲的差异性一体化。她提出,差异性一体化分为垂直和水平差异,水平差异又可以细分为内部和外部差异。俄乌冲突对欧洲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安全压力,一方面推动欧盟成员国加速形成差异性一体化,另一方面则激化了政治、法律与制度层面的冲突和困境,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欧盟东扩以及欧盟与“全球南方”的关系等问题开展研讨。严天钦副教授表示,土耳其因其地缘因素下的文明特性和长久的入盟“历史情愫”,在欧盟东扩的潜在候选国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研究土耳其的政治模式对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示范效应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土耳其的政治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民主化与世俗化的模式,较好地结合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本国伊斯兰传统,但其奉行的世俗主义原则带来了更多的军事冲突与纷争,导致土耳其模式仍然面临诸多困境。黄颖博士关注多边主义视域下的欧洲“全球南方”政策。她以 2023 年的慕安会报告为基点,归纳出欧洲与“全球南方”合作中遵循区域间合作范式、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从低政治议题升级到高政治议题和政治倾向地缘化四个特征,但欧洲“全球南方”政策面临认知差异、欧盟内

部缺乏协调、“全球南方”自身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等困境。

三 大选之年的欧洲经济与法律

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导致欧洲在经济竞争力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大选之年各国政治版图的变迁也对欧洲的发展模式与立法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与会学者就欧洲在绿色新政、数字治理、关键原材料、能源政策以及保护主义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与未来趋势开展研讨。本分论坛由成新轩教授和张彤教授主持。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者和先行者,欧盟制定的绿色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杜莉教授围绕 G7 气候俱乐部对巴黎气候协议目标的影响开展深入分析。她指出,随着气候治理从全球性框架向区域标准转变,各国利益的分化带来治理上的差异。G7 国家与欧盟组成的气候联盟试图通过统一的碳定价和碳关税来应对新兴经济体,然而研究表明,此类政策并未显著改善全球碳排放情况,反而对贸易和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此,杜莉教授建议建立一个灵活的应对机制,根据各国的政策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气候治理的复杂性。何樱灏博士回顾了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历程,并重点分析了冯德莱恩的欧盟委员会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她指出,在面临危机和阻力的情况下,气候政策更倾向于强调韧性和竞争力,因此,欧盟的气候政策仍将在总体上保持积极态势,并将在冯德莱恩的第二任期内致力于推动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绿色转型。党和莘博士通过分析《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揭示欧盟立法的新特性:欧盟域外管辖权从自愿性转向法律强制性,这将影响中

国的企业。尽管欧盟试图通过标准一致性和领土联系来正当化其域外管辖,但这些做法在国际法上存在争议。她提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可采取政策对冲和合理化解解释进行应对,以保护自身利益。姜冯安博士则引入了新视角,从分析欧盟的环境与社会治理(ESG)监管的双重路径入手,探讨欧盟的实践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他强调,随着欧盟扩大其域外管辖权,中国企业面临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和供应链管理要求,对欧盟 ESG 监管规则的有益借鉴能够助力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的 ESG 监管体系。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和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刘宏松教授分析了人工智能法案对欧盟数字主权的影响。他认为,数字主权的提升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欧盟的能力、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知情权、授权分配、商务目标以及监管与创新的平衡。黄燕芬教授认为,欧盟尝试通过建构数字主权成为全球领导者,但在数字服务税方面因成员国税收主权分散而面临挑战。通过对法国的相关实践进行分析,她指出,数字服务税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并建议在征税的同时采取配套措施以鼓励创新。金晶副教授以“四梁八柱”的框架为基础,分析欧盟《数据法》的创新概念和制度变化,指出该法案旨在推动数据共享和流通,提升市场竞争力,强调工业数据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保护中小企业免受不公平合同的影响。她认为,《数据法》的核心内容是强制数据持有者向第三方和政府提供数据,但排除了大型科技企业,这可能带来国际贸易和公共利益的风险。中国如借鉴欧盟立法,应留意这些潜在问题。

在地缘战略竞争背景下,欧盟高度重视关键原材料的获取和利用。中亚和拉美地区因

其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欧盟重点关注的区域。戴程娟博士与忻华教授合作研究了欧盟关键原材料战略的地缘政治背景,认为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将其视为实现能源独立和战略自主的重要手段,这将对中美欧战略竞争产生深远影响。侯鹏飞副教授对中亚关键原材料开发问题展开分析,强调该地区资源丰富,对欧盟能源转型和战略自主至关重要。欧盟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在该地区的频繁活动影响了原材料开发和供应。他指出,欧盟的战略调整和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将对原材料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钟婧轲博士讨论了欧盟与拉美在原材料开发方面的合作。自 2023 年以来,欧盟将拉美重新视为关键原材料供应和供应链多样化的战略伙伴,拉美的资源和数字经济潜力对欧盟的绿色转型和战略自主至关重要。她指出,欧盟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全球门户”计划等政策措施,加强与拉美的经济外交、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合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并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积极推动能源转型,提升对绿色能源的利用,降低能源对外依赖度,相关议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崔鏊戈博士分析了欧盟能源政策的最新动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她指出,欧盟和英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能源领域的地缘政治风险,但面临经济成本和外部依赖问题,这既为中国与欧盟的新能源合作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李倩媛副教授探讨了欧盟氢能产业链政策及发展进程,认为欧盟正采取双轨策略:一是强化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二是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并努力克服能源供应安全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

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全球保护主义趋

势日益明显,欧盟在投资和经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其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竞争和制度竞争。孔凡伟教授表示,近年来,欧盟的投资保护主义趋向有所强化,体现为制定新的外国补贴规则、修改外资审查体系和规划对外投资审查。在政治和安全因素的驱动下,这些行动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中国需要采取政企合作、改善商业环境、做好法律准备等措施,加以积极应对。董一凡副研究员认为,欧盟经贸保护主义在百年变局下呈现新特点,包括新型工具的使用、贸易政策维度的拓展,以及价值观和安全理念的融入,并指出这些措施虽对所有国家适用,但对中国影响最大,需密切关注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张亚宁副研究员发现,欧盟通过发布 5G 安全工具箱统一了成员国的监管标准。他注意到,地缘政治因素使欧盟成员国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增强,成员国将决策权转移给欧盟委员会以应对 5G 监管挑战。这一现象在中等国家更为显著,但在德国等大国的体现不明显。张颢副教授就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美国盟友在 5G 政策上的不同反应进行研究。他表示,尽管传统观点认为是美国压力导致盟友政策变化,但案例分析显示,小盟友也可能采取更激进的态度,从而倒逼美国。此外,小盟友间也会产生相互影响。他指出,该发现挑战了现有联盟管理理论,强调了重新评估小盟友作用的必要性。樊文静副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欧服务贸易合作并未对欧盟国家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有助于提升高技能就业,该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中欧服务贸易的实际经济效果,为双边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四 大选之年的欧洲外交与安全

在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安全形势复杂

化的趋势下,欧盟对其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外部冲击使欧洲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地缘政治逻辑的重要性,而内部矛盾又始终制约着欧洲开展地缘战略的能力与决心。基于此,与会学者从欧洲国家的周边战略、美欧关系、中东欧国家的作用,以及欧盟防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讨论。本分论坛由赵怀普教授和邢瑞磊副教授主持。

美欧关系仍然是欧洲外交与安全的重要基石。隆德新副教授关注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制裁问题。他指出,制裁盟友和制裁对手的逻辑不同,从历史上美欧之间的几次制裁来看,做出确保性承诺是成功制裁盟友的关键,影响承诺可信度的因素主要包括承诺成本、威胁认知的差异性与国内观众成本。徐子归博士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荷兰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他指出,荷兰在美欧经济安全关系塑造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保护、合作与推动。在美欧经济安全协调方面,荷兰对华采取了“均衡敏感”的态度,对美则采取了“微妙追随”的态度。中国在与荷兰进行经济合作时,需采取灵活且谨慎的策略,既要维护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要避免因俄美关系及欧洲内部政治因素的变动而引发的潜在风险。龙希博士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法国外交独立性的影响问题。通过对法国和北约关系、法国对华关系,以及法国对美元的打击三个案例的分析,她认为,欧洲一体化对法国外交独立性所产生的积极一面在于法国可以借助欧盟的力量重返世界大国地位,消极一面在于欧盟的规范和规则对法国外交产生了限制。

在进一步协调美欧关系的同时,欧洲国家也开始在周边与全球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措施,力求在世界变局中保持自身影响力。吴贺副教授探讨了欧盟黑海战略的特点及影响。她

指出,几百年来,黑海地区一直是美欧俄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冷战结束以来,欧盟的黑海战略从强调自身的独立性,逐渐走向了与美国黑海战略的趋同,并且其进攻性愈发明显。这种趋势的发展是美国胁迫的结果,使欧盟的黑海战略愈加脱离地缘政治现实,忽视了俄罗斯的立场。姚乐博士围绕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实施展开分析。她指出,“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能源危机、难民问题等现象带来的挑战是欧洲加大在这一地区投入的主要原因。当前,其投入的领域主要包括绿色转型、数字化和互联互通三个方面。这一战略的实施加剧了中欧之间的竞争关系,中欧应当在这一地区合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避免双输结果。杨继龙博士则从战略自主的视角切入,分析欧盟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指出欧盟对“全球南方”的介入存在四个特点:一是政治导向而非发展导向;二是基于地缘战略竞争而非包容性合作;三是分化导向而非团结导向;四是攻击“全球南方”而非赋权“全球南方”。这些特点会影响“全球南方”的凝聚力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江琪博士的研究聚焦于法国对非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她指出,从希拉克到奥朗德时期,法国始终致力于与非洲建立新型平等关系,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马克龙上台以来,从三个方面对法国的非洲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体现在强调与非洲建立一种平衡互惠和负责任的关系,重点发挥支点国家的战略作用,并将多边主义作为长期趋势。这些调整无法改变非洲国家对于法国的殖民主义印象,并且会进一步引发非洲国家的国内矛盾。瞿姗姗博士分析了意大利的对非战略,指出能源危机和难民危机是意大利调整对非战略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意大利制订了雄心勃勃的“马泰计划”,提

升了自身在欧盟和跨大西洋联盟中的话语权。但受限于国内能力和政治稳定性,其战略的实际效果仍然有限。

中东欧国家影响力的增强是近年来欧盟内部的发展趋势之一,俄乌冲突的爆发促使这一进程加速推进。宋黎磊教授指出,2024 年是欧洲最大一轮东扩的二十周年。刚加入欧盟时,中东欧国家声音微弱,只能扮演政策追随者的角色。但二十年来,中东欧国家的能力迅速增强,在欧盟内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中东欧国家在价值观、政策方针、欧洲安全等方面深刻影响了欧盟的外交政策。王弘毅博士利用安全文化这一概念,论证了中东欧国家在北约东扩中的作用。他认为,北约东扩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来自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衡,而是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俄罗斯恐惧症”。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将呈现对立的平衡结构,欧洲安全结构的军事重心正在发生东移,中东欧国家在北约的安全话语权,以及在欧盟内部的相对权力都会呈现上升趋势。杨博文博士阐述了中东欧安全架构的调整,他发现以 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为关键节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政策从融入欧洲安全结构转向试图建立多层联盟的安全结构。中东欧国家的体量、小联盟相对于大联盟的优势,以及北约覆盖面的有限性是中东欧国家在北约之外建立小联盟的重要原因,这也意味着这些小联盟将会长期存在。

虽然地缘政治的回归使欧洲国家意识到保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性,但欧盟防务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杨海峰副研究员对地缘政治委员会时期的欧美安全与防务关系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指出,就目前的进度来看,2022 年欧洲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为欧洲防务体系发展制定的目标基本能够按期实现,但这是因为目

标本身比较容易达成。北约仍然是美欧防务关系的主要校准点,美欧防务关系正逐步趋于自主发展和相互补充并进的路径。欧洲防务产业的发展体现了上述判断。王皓副教授关注欧洲防务体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发展,聚焦于欧盟的数据安全治理。他指出,近年来,受到中美战略竞争激烈化、跨境数据流动重要性增强,以及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等因素的影响,欧洲数据治理越来越强调数字主权。中欧在数据治理中存在潜在的合作机会,但法律与政策的不一致、信任缺失等问题阻碍了双方的合作。中欧之间在数据治理中应加强对话,制定共同标准,推动示范项目。赵健哲博士则从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切入,论述了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发展进程。他指出,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是自身战略自主与美欧关系的平衡。欧盟试图在增强战略自主的同时,避免内部团结性受到损害,同时又希望以有限的投入去满足长期地缘政治威胁的防务需求。姜昊博士回顾了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的历程。他从国防工业建设和欧盟委员会的作用两个方面,阐述了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的发展趋势。未来欧盟共同防务建设仍然面临两大局限性:一方面是成员国内部的协调;另一方面则是美欧对于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的差异性定位。

五 大选之年的欧洲社会与文化

在世界格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欧洲的社会与文化正在遭受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回潮的剧烈冲击。欧盟对华定位的转变也导致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呈现消极变化趋势。基于此,学者们对欧洲社会文化思潮、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建构以及欧洲历史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分论坛由路征教授和刘华教授主持。

与会学者运用语言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视角阐述了欧洲的官方话语建构和中国形象建构。张莉教授引入趋近化理论,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欧盟的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的特点及立场进行比较分析。她认为,在能源安全议题上,欧盟官方话语建构强调凝聚力,希望各成员国和各个地区的民众能够统一认识,共同面对威胁与困难,其总体基调是积极正面的;而媒体话语则着重渲染欧洲当前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和能源危机的严峻形势,其基调更为消极负面。张立新教授认为,俄乌冲突不但在现实层面,而且在理论层面面对欧洲一体化造成了巨大冲击。通过对欧洲媒体的话语叙事的分析,他指出,新功能主义话语叙事在现实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政府间主义次之,后功能主义最少。张立新教授还借助话语层面的分析,对欧洲一体化理论做出了修正。赖雪仪副教授对欧盟官方的社交媒体账户中涉及中国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她指出,在中欧竞争深化的背景下,欧盟官方的社交账户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并没有想象中的频繁,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并不算高,欧盟内部议题的重要性高于中国议题。中国学者在开展研究时,要避免主观倾向。何晴倩副教授收集整理了海外视频平台“油管”(YouTube)上中东欧用户的海量数据,并借助 ChatGPT 大语言模型,对中东欧国家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情感是中立的,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持有积极友好的态度,但同时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政治以及外交政策有所质疑。

宗教因素对欧盟和成员国的影响亦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张崇富教授认为,欧盟的发展建立在欧洲性上,而对欧洲性的研究与探讨离不开宗教思维。他指出,欧洲煤钢共同体初建

之时,其创始六国均为基督教民主党执政,如今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所举的旗帜同样是宗教文明,因此宗教是欧洲身份的重要来源和构成因素,并且极有可能是影响欧洲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涂东副教授探究了宗教因素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影响。她认为,宗教在波兰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波兰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上以宗教及其价值观为核心叙事,用所谓“推广宗教自由或信仰”的名义来识别并拉拢伙伴,以达到遏制竞争对手的目的。这为理解波兰与乌克兰、波兰与美国等双边关系提供了宗教文化角度的解释。

中欧文明交流互鉴也是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王义桅教授对中国欧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欧洲的发展历史存在差异,但中国与欧洲在命运与共的文化内涵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需要超越中国中心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用中国的逻辑、欧洲的逻辑以及世界的逻辑三个路径去研究欧洲。李丹教授从区域治理的角度,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一体化进行比较,认为“一带一路”从主体、主题、范围、途径以及特征五个方面实现了区域治理理论的创新与超越。陈铭博士则从文明观的角度对中欧外交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指出,中国与欧洲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了各自的外交政策,中欧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均重视国际规则与国际合作,并积极推行多边主义;但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有韧性的国际秩序,欧盟则强调并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

与会学者还对欧盟和欧洲国家存在的社会、文化问题开展深入探讨。钱运春研究员认为,中国和德国都面临着养老问题的挑战,而德

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能够从“中央统筹、地方配套”“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以及“弘扬优秀养老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解决养老问题提供参考。林力副教授认为,城市收缩不仅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亟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她选取了德国莱比锡、英国利物浦以及意大利米兰三个存在收缩现象的代表性城市,阐述了三城出现收缩的原因、类型及所采取的措施。张壹铭博士探讨了欧洲移民问题对欧洲内部环境的影响。他认为,移民保障了欧洲人口增长、缓解了欧洲的老龄化趋势、推动了欧洲战后经济复兴,对于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在社会层面引发了欧洲民众对不同类型宗教的恐惧,进而引起种族间的仇恨。在政治层面,移民导致国际问题国内化,推动了民粹主义抬头趋势,引发了欧洲对于身份政治的争议。靳倩倩博士认为,以比利时为代表的欧洲多语言国家在国内语言区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身份冲突,并且以语言群体为界限形成了各自的政党,建立了排外认同。她指出,语言既成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形成并崛起的原因,也成为欧洲分离主义叙事的重要工具。

研究者还对欧洲历史开展探讨。石烁博士阐述了欧洲近代早期的妇女问题,指出女性主义并非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而是具有非常漫长的传统。她从历史学的视角,以跨时代、持续不断、题材多样三个特点概括欧洲针对妇女问题的争论,认为该争论是值得被探究的欧洲历史传统。欧阳天亮博士对绝对主义和绝对王权进行了概念史的考察。通过对历史著作和文本的探究,他指出,绝对主义和绝对王权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从稳定秩序、保护民众的褒义概念向专制主义、集权暴政的贬义概念

的转换,其主体也经历了从国王的权力到主权的权力之间的转换。

六 大选之年的中欧关系

大选之年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深刻作用于其对外政策,进而对中欧关系产生多维度的影响。美国大选的同期举行,使得中欧关系的演化充满更大变数,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分论坛由王萍研究员和张海洋副编审主持。

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欧关系的变革。张骥教授认为,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重大演变,呈现出国际政治再国家化、地缘政治回归、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及文明冲突和对抗加剧的特点,对国内治理和国家间交往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方提出的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的中欧关系定位正面临挑战。中欧之间如何完成对双方关系的再定位并寻求合作空间,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简军波副研究员指出,双边主义既未能有效解决中欧之间的矛盾,也无法应对涉及第三方的复杂问题。据此,他提出后双边主义模式,认为其是中国对欧政策中应该采用的一种有机模式,即在保持双边合作的基础上,融入多边主义的元素,综合考虑第三方和地缘政治竞争因素,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赵柯副教授指出,中欧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深入到政治与价值观层面。当前,中欧双方在利益判断与政策理解上存在着偏差与分歧。在思考中欧关系变化的性质时,可以从欧洲人对世界看法的转变,欧盟从贸易货币集团向军事安全集团的转变,以及欧盟对华政策的价值观、战略框架等维度进行考量。

近年来,欧盟将中国视作经济上的竞争者,在经贸领域出台部分消极举措,对中欧关系造

成了负面影响。熊炜教授指出,在技术领域,美欧关系最大的变化是2021年6月宣告成立的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向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其成立将在技术经贸领域对中国产生连锁效应,对中国科技实行软脱钩和硬制裁,致使中国创新链、产业链受损,并阻碍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应采取自强、分化、联合策略,以应对在美欧双选举背景下美欧对华技术协调出现新的可能性。张迎红研究员认为,“去风险”策略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其核心在于减少对华依赖,实现部分“脱钩”。欧盟成员国对华立场大致可分为四组:早期倡导者(法国)、跟随者(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谨慎实施者(德国)和反对者(匈牙利)。各国在执行“去风险”策略过程中需要平衡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同时也要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和全球战略格局。这一策略的实施将继续塑造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张超副研究员指出,欧盟将“全球门户”倡议视作在地缘政治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路径,因此,在操作层面已排除了两个倡议对接的可能性。中国应重视对话交流,建立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利用互联互通平台加强合作,在卫生环境等低敏感度领域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李明副教授以相互依赖为视角,从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出发,讨论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转向。从互动因素看,欧盟对中国的角色认知发生了变化,实力对比和相对收益影响欧盟贸易预期;从外源性因素看,美国对华政策及俄乌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内源性因素看,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对于政策的制定将会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应创造欧盟对华贸易乐观预期的环境,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交流。解楠楠博士围绕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进行细致解析。“去风险”呈现三层架构,即以

经济安全战略为核心,包含竞争政策及工具,体现了经贸政策地缘政治转向和金融化脱钩的特征。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以及经济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为“去风险”政策框定了上限。未来,欧盟与欧洲议会的对华政策将更加趋同,欧盟经济外交的地缘逻辑将更加凸显,同时欧盟的对华政策可能呈现根据语言文化区域而差异化发展的趋向。

影响中欧关系变化的具体因素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严少华副研究员探究了欧盟领导层更迭所表现出的四个特征:欧盟委员会专员权力相对缩小,冯德莱恩对欧盟委员会控制力的增强,中东欧成员国的影响力上升,法德的影响力下降,以及极右翼势力的扩大。对中欧关系来说,这意味着冯德莱恩在欧盟对华政策塑造方面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一届欧委会的就任可能带来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新一届欧洲议会党团层面的变化可能为中欧交往提供新契机。刘力达副教授通过探究欧洲议会及各国选举结果,发现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这对中欧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疑欧倾向使得欧洲一体化受到挑战,导致欧盟战略优先性难以达成一致。但政党本身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可能会减少中国的政治压力,中欧关系的未来将取决于欧洲在交往中所获得的收益。

中欧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王功博士认为,俄乌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得台海局势面临的安全风险不断扩大,欧洲把中国台湾视为所谓的“民主盟友”,呼吁加强双方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合作,在台湾问题上,欧盟极有可能追随美国立场。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可能会助长美国“以台制华”的行为。顾苏博士探讨了欧盟数字监管呈现的趋势,如加强数

据主权控制、推动监管模式转向、输出标准和治理模式,以及建立网络安全与数据平台多层次治理架构。这对中欧关系的传导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合规成本提高、技术标准和制度竞争因素上升,并影响信息主权与虚假信息治理。她进而讨论了中欧在合作空间、制度竞争及安全问题外溢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欧关系中的绿色合作也是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吴侨玲教授认为,今日的中欧关系深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欧盟选边站队的影响,欧盟把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追随美国采取遏制战略。在此背景下,中欧绿色合作的挑战大于机遇。中国有必要对此采取反制措施,促使谈判对手考虑我国意向,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王硕博士通过回顾中欧绿色合作的四个阶段,分析中欧互动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指出目前中欧处于竞合状态且竞争大于合作。欧盟向“地缘政治欧洲”的转型,中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倡议所引发的欧盟焦虑情绪,美国气候政策的非线性变化及其在中欧绿色合作中的负面影响,都构成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转变的动因。

七 大会发言与闭幕式

20日上午的大会发言环节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贵昌教授主持。郑春荣教授从态势转变、最新动态、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欧合作前景四个方面阐述了欧盟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他指出,欧盟印太战略已经从地缘经济战略上升到地缘政治战略,欧盟配合美国介入印太的态势越发明显。其最新动态表现为政治外交领域的对华强硬、经贸投资领域的对华竞争,以及安全防务领域的地区介入。欧盟印太战略的调整对中欧关系带来一系列挑战,

包括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侵蚀,对中欧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他认为,中欧之间应加强战略互信,促进亚太和印太地区的经贸产业合作,并强化在亚太、印太地区的安全对话。

丁一凡教授以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为切入点,阐述了中欧关系的变化与挑战。他指出,欧盟已经将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发展视为对欧洲汽车工业的巨大威胁,试图利用高关税政策为欧洲的电动车发展赢得时间。而德国之所以采取了不同态度,是因为德国的电动车大量利用中国技术,以此保住了世界市场的份额。中国电动车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弯道超车,与移动终端的发展模式、引进特斯拉的“鲑鱼效应”,以及中国的电力产业与技术基础紧密相关。然而,美国的“长臂管辖”阻碍了中欧合作,中国若想摆脱外部制裁所造成的脱钩断链,必须进行大量的技术积累,完善电动车产业链。

田德文研究员讨论了欧洲“政治衰败”的原因与走势。他指出,欧洲政治无法解决其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一现象可以类比为政治学中的“政治衰败”。他认为,欧洲之所以会走向“政治衰败”,是因为欧洲政治的后现代性。虽然欧洲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保持稳定,但社会从多元化开始走向碎片化,政治力量缺乏整合社会的能力。从发展趋势来看,欧洲政治或许会越来越依附于美国。

段德敏研究员以后殖民主义为视角,对欧洲的“规范性权力”进行了审视。他认为,欧洲对“规范性权力”的定义存在一个演变过程。当前,很多欧洲人已经意识到后现代式的“规范性权力”设想不再符合现实,于是再次强调地缘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他指出,欧洲对于权力的定义本就包含双重标准,从来不认为仅仅

依靠规范就可以拥有权力。这种双重标准并不能带来和平的世界秩序。真正的世界秩序规范应该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结果,尤其需要“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参与。

闫瑾副教授探讨了欧洲议会政治极化对德国外交政策及中德关系的影响。她指出,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是欧洲主要国家国内政治的风向标。欧洲议会的政治极化主要表现为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攀升、议席增加,以及主流政党席位缩水、力量碎片化。德国选择党的外交政策纲领强调国家利益的优先性,试图在大国地缘政治中寻求平衡。然而,她认为,由于德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政党碎片化格局,以及选择党自身的极右翼标签等问题,德国选择党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有限,中德关系仍然有发展空间。

冯绍雷教授认为,当前全球转型正在进入新阶段,大国关系正经历再调整,各主要国家之间呈现出新的互动态势。美国大选、欧洲新右翼与俄罗斯的勾连以及俄罗斯内部政治力量的演变都将对欧洲和中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他指出,要从世界秩序形成与发展的长期趋势、中国崛起与中美竞争的中期趋势以及俄乌冲突持续的短期趋势三个视角出发,更好地理解全球转型进程。

在小组汇报环节中,赵晨研究员、姜冯安博士、邢瑞磊副教授、路征教授和李明明副教授分别对五个分论坛的讨论情况做总结汇报。

闭幕式由中国欧洲学会副秘书长郑春荣教授主持。首先,大会对理事增补进行表决。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赵江林研究员热烈祝贺本届年会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并对中国欧洲学会的工作、对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对会务组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她希望此次会议能够为中国学者做好欧洲区域国别研

究起到推动作用,对中国欧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起到促进作用。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学玉教授回忆了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年来与欧洲学界的密切互动,感谢中国欧洲学会和国内欧洲研究同仁对中心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欧洲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角色和力量的重大转变,直接的动力是俄乌冲突,但这一趋势背后包含着更为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欧盟内部的重塑和外部的张力都推动中国学者对欧洲形成新的认知并及时调整对欧政策。他强调,中国学者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变化的结构性属性,还要考虑到这些变化对发展中欧关系的战略性意义。这都需要中国学者们在新的条件下,通过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范式和新的框架来解释和理解中欧关系,为重建中欧之间的社会互信与政治互信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本届年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既对近年来欧洲与欧盟的政治经济动向、社会文化变迁与对华政策演进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也关照更长时域内欧洲历史发展的规律、逻辑与趋势,提出欧洲一体化的原创理论与视角,尝试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现代化的进程开展比较研究,集中呈现了中国欧洲学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成果。

(作者简介:付腾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玉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易靖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博维,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方弈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责任编辑:齐天骄)